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日本人的进出甘肃

高启安

(兰州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摘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打着各种旗号的外国探险队、间谍纷至沓来,其中日本人不在少数。除国人熟知的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外,在这之前还有数拨。最早来甘肃的是 1888 年的浦敬一和藤岛武彦等人,继之路过甘肃的主要还有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以及藤本强、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人次。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关于当时甘肃的种种记载,成为日本人最早的反映甘肃情况的史料。

关键词 :日本人;进出;甘肃

中图分类号 :K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4-0119-06

Japanese entering and eparting Gansu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GAO Qi'an

(Lanzhou Commerce College,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Between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many expeditions and spies came to Gansu under cover of various reasons. Many of them were Japanese. Before Zuicho Tachibana and Shoichiro Yoshikawa, who were very familiar to us, there are a few more Japanese had been to Gansu. The earliest Japanese had been to Gansu in 1888 were Urakeiichi and Fujishimatakehiko, then there were Fujimoto, Hayashidekenjiro, Hatanoyosaku. All of them left more or less records, which were the earliest records about Gansu made by Japanese.

Keywords : Japanese ; Entering and Departing ; Gansu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积贫积弱、腐朽的清王朝即将灭亡、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和动荡不安的时期,列强已由觊觎肥美中华变成了赤裸裸的掠夺和侵略。而为瓜分这块肥肉,各列强展开了或公开、或暗地里较劲的激烈争夺。争夺的一个前提,就是以各种考察、探险和旅游的名义进行的情报搜集和资源掠夺。据不完全统计,从 1876 年到 1928 年的

半个世纪内,仅出入中国西部的各种考察队、探险队,达到了 42 批之多^[1]。捷足先登者有之,步踵后尘者更是肆无忌惮。日本人在袞袞探险者中非但不是姗姗来迟者,而且还是比较活跃者。

其中,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于 1910 年到 1911 年先后来到敦煌及莫高窟,采取种种手段,从王道士及当地其他人手中获得了

收稿日期 2010-10-15

作者简介 高启安(1957—)男,甘肃省景泰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从事敦煌学,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

大量的藏经洞文物,从而为中国人所熟知。其实,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并非是进出甘肃和西域最早的日本人,也不是最晚进入甘肃的日本人。那么,在这之前,还有哪些日本人何时、以何种目的进出过甘肃呢?

在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来甘肃之前,至少有五批日本人数次经过兰州及河西。

浦敬一等人新疆之行居留甘肃

第一次有日本人进入甘肃,是在19世纪末叶。他们不仅在兰州开设了书店,而且有可能进入了河西。这就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荒尾精(时为汉口“乐善堂”“堂长”)等在武汉建立的“汉口乐善堂”派员到中国各地进行的情报调查活动和特殊使命。

由于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强盛,日本对英俄等西方列强蚕食中国极为不满,谋求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实现自己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一些当时日本的精英分子,为此开始了经营大东亚的战略,岸田吟香、荒尾精和后面要提到的宗方小太郎,均是这些人中的翘楚。他们网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药店、书店等,名为经商,实为了解中国,搜集情报,推行其以日本为领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广袤的中华大地为战略纵深的大东亚战略,即所谓“兴亚”战略,与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政策相抗衡。而派往甘肃及新疆的浦敬一等人,其具体起因是1888年,俄国发表了“西北利亚铁路建设计划”,荒尾精等人将其视作俄国东渐蚕食中朝的大举动,“此举实在让人丧心炫目。盖俄国此大业如完成,其如欲干预东方之事,依靠该铁路运送军队,不出旬日,数十万大军将得以集中于中朝国境,俄国经营东方的雄图,将达此目的,满洲、朝鲜将直接在其铁蹄之下遭受蹂躏。此如同明镜般明了。”^[2]因此,他们商定,派员去新疆,说服时任伊犁总督的刘锦堂在西边设法牵制沙俄,并做好防御准备,阻止沙俄对新疆的东渐蚕食。上述浦敬一等人的新疆之行虽未能实现,却是受荒尾精等人派遣,实现其战略意图的一次举动。客观上成为近代日本人第一次进入甘肃。

鉴于俄国人的举动,“乐善堂”制定的策略如下:

其一,俄国将来的西北利亚铁路,是向中国方面扩张势力,因此,必须加强边防,预置防遏策略。

其二,至迟在十年之内,实行中国的改造。

其三,为了防遏俄国的东渐,所实行的策略是:派遣浦敬一去伊犁方面,临机处置。

其四,除湖南支部外,设立四川省重庆府支部,探究该地实况。

其五,探查北京宫廷任务的行动,视察中央的政况,踏查遥远的关外满洲的形势^{[2]199}。

浦敬一去新疆的目的有八:“第一是亲察俄国人可能进入中国的路线(伊犁路、阿克苏路、塔尔巴哈台路、喀什噶尔路等四大路线)的状况,第二是尽可能考察新疆的防御状况、考察其地形气候等的利用,第三是考察新疆的回族、喇嘛族及屯田兵、流民等状态,如为我所利用,最大限度可利用几许,还要考察研究如何收揽、综合利用之。第四是考察清朝政府对于俄国的防御方法、兵备配置、对回民汉民的施政、屯田及流民的安置、开垦、牧畜等的奖励法等。第五是考察清朝政府维持新疆的费用和经费之事以及其来源,并且对当地人、屯田兵及其他耕地的课税状况。第六是新疆各地的牧畜、耕作、商业、库藏等的实况,计算物资的多寡,而且分析一旦有战事,清朝的物资供应、运输等,以何种方法准备。第七,新疆各地的要路,以及回民、汉民的形势、官员配置以及人员的预算等。第八,畜牧业、开垦、商业等状况,新疆官吏的管理以及本部费用和资本的状况。”^{[2]201-202}

但由于对西部状况缺乏了解,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第一次,浦敬一与北御门、河源三人,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六月十八日从汉口出发,向西北伊犁进发。

关于浦敬一等人的行踪扑朔迷离。据山崎羔三郎寄给其兄的信:浦敬一等人从汉口出发前,按照约定,藤岛武彦和大屋半三郎二人先期到达兰州,开设书店,从汉口运送约千余元的书籍来兰州,以书店的盈利来资助浦敬一等人新疆之行。^{[2]207}但他们到达兰州后,没有找到藤岛和大屋以及开设的书店。在兰州空等了一月有余^{[2]209},尚不见二人(藤岛和大屋在运送书籍路途中,遇到“强盗”,仅以身免,故而未能到达兰州,等折回襄阳筹集到资金于9月到达兰州后,浦敬一等人已离开数日,于是只好返回汉口。返回的时间是明治二十二年一月^{[2]214})。此时,由于经费拮据,语言不谙,三人因去留产生了分歧,于是,浦敬一返回汉口(10月29

日),以图再举,北御门和河原二人负气转道去了北京^{[2]210}。

明治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浦敬一和藤岛再赴兰州。二人装扮成广东或福建人,并为自己起了中国人的名字,浦敬一叫“宋思齐”,藤岛叫“宋克己”^{[2]217}。二人计划的行经路线是:汉口、襄阳、老河口、紫荆关、陕西蓝田、西安,在西安是为卖掉所携带的书籍,筹集经费。从西安出发,经凤翔进入甘肃,经甘肃省的秦州、巩昌府、狄道州、兰州、甘州、肃州、嘉峪关,经玉门县越沙漠,到达哈密,在新疆的路线是: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伊犁。回返的路线是: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再顺天山路经阿克苏至喀什噶尔,由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翻越昆仑山到达西藏。在西藏,将巡视前藏后藏及中印、中缅边境,考察从印度、缅甸进入西藏的路线及防御策略^[3]。结束后,从四川的打箭厅经成都到重庆。

“九月某日到达甘肃省兰州府,正当将越嘉峪关向遥远的伊犁方面进发之际,藤岛因故在兰州城外西方四十清里的一个小村庄返回。”^{[2]221} 据说二人因经费问题发生争执。

据日本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浦敬一和藤岛武彦的分手,是在兰州城外四十里的一个村落,而非嘉峪关,分手的原因是经费不足,无法支持二人漫长的西行,于是,浦敬一分得五十四两银、藤岛分得十八两银,二人各奔东西,浦敬一继续西行。到明治二十五年(1892)的夏天,浦敬一便没有了消息,不知下落,估计死于非命。因此,“乐善堂”的宗方小太郎于明治三十三年二月还在上海撰写了《亡友招魂碑》以纪念。而在日本,则流传有他的种种传说:或入藏,或流落蒙古^[3]。明治二十六年7月1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在题为《支那内地旅行者的踪迹》一文中则有另外的说法:“根据数月后清朝的新闻,有日本人两名,俄国人三名、一车二马,在甘肃边境旅行。在汉口的友人谈论着所谓日本人二名即浦敬一和藤岛武彦。后来的一个月中,根据天津的飞报,‘日本人二名在关外的新疆一侧遭难,一人迅速逃跑,另一人死于格斗’。”^{[2]225} 如此“飞报”确实,则二人已穿越河西走廊,到达新疆。但在日本,还流传着浦敬一并未亡命,以浦敬一的才能和坚忍不拔,可能在蒙古族牧羊、甚至当了柯尔克孜族首领以及在西藏做了喇嘛、继续为实现其梦想而活动的种种传说^[3]。

藤岛武彦其人,则于此后回到日本家乡鹿儿岛,后在大阪置办纸革制造所,筹办经费,复于甲午战争期间赴中国,装扮成僧人,为日军刺探军事情报,在镇海被中国方面捕获处死^{[3]450}。

据《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研究》,这是日本人最早的中国西北之行,“如果成功,这应是日本人最早的横断丝绸之路的旅行”^[4]。

虽然新疆之行没有成功,但却是日本人近代第一次到达甘肃及兰州。

关于藤岛武彦在兰州的活动,没有留下具体的史料。

“和浦敬一分别后返回的藤岛武彦,把甘肃方面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兰州开设了书店,和另一个成员乘船,溯汉水而上运送书籍,将兰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江苏省和河南省也留有关于他的逸闻,他的确也去过兰州。只是目前没有看到关于他在兰州活动的具体资料证据,不掌握在兰州的状况,但是,在这之前,他和浦敬一同行,到达嘉峪关以西,来往都通过兰州,或者应当在那儿停留过,且有三次。”^[4]

根据《浦敬一》一书,藤岛在兰州活动的时间,其实就是筹集经费以备新疆之行,和浦敬一分别后,可能即离开了甘肃,没有史料表明他在这以后继续留在甘肃。

据认为,藤岛武彦就是撰写《兰州纪要》的作者。《兰州纪要》是日本人撰写的最早介绍西部(不局限于兰州)地理、人文等情况并分析甘肃所处战略地位的一篇文章。此文是遵照荒尾精的指示实地所做的调查分析资料^{[4]43},原文作为“东亚同文书院”资料,现藏于日本爱知大学,一直没有出版,近年才由研究者整理发表^{[4]65-79}。《兰州纪要》如果确为藤岛武彦所撰写,当是藤岛武彦在甘肃等地游历以及在兰州经办书店的时期,即1890年左右。

笔者臆测《兰州纪要》的作者或者可能为浦敬一。浦敬一第一次新疆之行时因等待藤岛和大屋,在兰州待了约一个月后才返回,此间极有可能闲来无事,调查撰写《兰州纪要》,返回汉口后交给荒尾精等,使这一资料保存了下来。藤岛此人可能不喜爱写作,迄今除了写给浦敬一父亲的信,告知浦敬一失踪的消息^{[2]221}外,尚未见他留下的其他文字资料,而浦敬一喜欢写作、记录,因而留下了许多在中国的各种记载、信件^[2]。

这是近代日本人最早进出甘肃,进入甘肃的时

间约为 1888 年前后,甚至在兰州贩卖书籍,现在已无法知道他们在兰州的何处开设书店、书店的名字叫什么。开设书店的目的除筹集经费外,显然是为了搜集情报的方便。关于是否到过嘉峪关甚至新疆,有两种说法: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藤岛和浦敬一分手的地点不是嘉峪关,也不是新疆,而是兰州西,按距离,当在今安宁沙井驿一带;而《支那内地旅行者的踪迹》一文则暗示在新疆一侧的两名日本人即浦敬一和藤岛武彦。另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研究》说藤岛等可能有两次河西之行,而且到达过嘉峪关以西,在兰州盘桓的时间约有四年之久。但综合其他史料,这些说法于理不合。浦敬一与藤岛武彦分手后即杳无音讯,藤岛也放弃了新疆之行的使命,不可能在兰州蛰伏好几年以图再举。

渡边哲信、堀贤雄经过甘肃

第二批是大谷光瑞第一次中亚探险的随从渡边哲信、堀贤雄,他们在大谷 1902 年中亚考察中,在塔什库尔干和大谷分别,到了叶儿羌,此时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10 月 14 日。在考察了南疆的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乌鲁木齐后,于明治三十六年 10 月中旬,离开乌鲁木齐向哈密进发。18 天后到达哈密。11 月 3 日从哈密出发,11 天后到达安西,然后经玉门县到嘉峪关,经一日到达肃州^[5],走的是哈密、星星峡、柳园、安西、嘉峪关、肃州、甘州、凉州、兰州这一路线,中间没有经过敦煌。渡边哲信在其所著的《中亚探险谈》中,与甘肃有关的内容有“嘉峪关和肃州”、“和检察使说”、“在异乡遇见了胞弟”、“董福祥近况”、“中国事情和归国”等节:“我们从哈密出发,经过 11 天到达安西,但这儿也是一处很凋零的地方,城的外郭只有破败的村落,由此经玉门县到达嘉峪关。因为到达时正好是夜间,几乎不给开嘉峪关的城门,按同行的中国人的说法是因嘉峪关是天下七镇之一,一般夜间不给开门,我们的随从出示了护照后,才勉强给开了门。因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西端,从此处渐渐进入了中国腹地。从嘉峪关经一日到了肃州,这儿是一个相当大的都会,由于回匪之乱(回教徒和汉人的战争)现在是大大地衰退了。从肃州经六日到达甘州,此地是一个煤炭非常多的地方,而且是无烟煤,一斤仅值二十八文,因甘州附近缺少柴薪,当地人都将煤炭作为

燃料。”^[5]

因为二人基本上是考察结束后取道河西走廊回国,因而没有经过敦煌。后来他们听说斯坦因、伯希和在之后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宝物,后悔不已^①。

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行经甘肃

第三批是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期学生林出贤次郎及波多野养作、草正吉、三浦稔、肥田(樱井)好孝的新疆、蒙古行。其中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以及樱井好孝三人曾于 1905 年经兰州、河西到新疆。“1902 年(明治三十五年)因对俄关系,日英结成同盟,日本方面为了掌握俄国在中国西北部的侵透状况,要求进行调查。同时负有外务省使命的根津一校长把这个调查委托给了从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期毕业的五个学生。这五人是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草政吉、三浦稔、樱井好孝。1905 年,分别从外蒙古启程进入新疆西端的伊犁。”^{[4]13}

“林出贤次郎为新疆(伊犁)派遣员,明治三十八年(1905)五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经北京、正定、娘子关、太原、蒲州、潼关、西安、兰州、嘉峪关、玉门关(引者注:从其他资料看,当是今天的玉门镇,而非今日敦煌之玉门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乌苏精河,到达伊犁;回来的路线是土尔扈特郡王府、春风口、塔城、乌鲁木齐、吐鲁番、兰州、郑州、北京。回到日本的时间是明治四十年四月二日。波多野养作为乌鲁木齐派遣员,从东京出发的时间是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三日,经北京、西安、兰州、哈密、吐鲁番到达乌鲁木齐。明治三十九年十月回返,又从兰州到青海旅行考察,途径宁夏、河套、张家口、北京回国。乌里雅苏台派遣员草政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十日从东京出发,回返是三十九年七月一日。”^[6]“林出贤次郎于 1905 年七月十八日从东京出

① 渡边哲信《话说西域大流沙》:“没有去敦煌是千古的遗憾事”一节:“在库车滞留的时间有点过长,对于今后剩余旅程的路费是否够用,心中没有底。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态上路,虽然对敦煌千佛洞的壮观早就有所耳闻,也知道《西域水道记》等书中详细记录的东西,在大约一个星期的返程途中,对于途经的敦煌也没敢前去探访。后来的几年里,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攫取了世界性的功名,而我们自己呢,虽然有首先到达敦煌的机会,但是却失掉了这次机会。这真是千古的遗憾事。”转引自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 48 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年。

发去伊犁,翌年四月十八日到达。”^{[4]18}

林出贤次郎于8月29日离开西安,翻越六盘山进入甘肃地界,在兰州期间,由于痔疮骤犯而不能继续前行,“9月26日,住入甘肃省城兰州五泉山下英美人经营的福音堂医院,两个多月,在医院的病榻上呻吟,由此处的英美人医生操刀做了手术。住院费一天拾钱,其便宜程度令人吃惊”^[7]。由于林出的入院治病,波多野和樱井先期出发。林出在出院后,住在四川人开设的旅馆里。外国人在兰州逗留期间,必须向洋务局申报。林出在洋务局申报时,见到了时任道台的王树楠先生,并数次到王公馆做客,和王树楠之子一起游玩^{[7]176}。可以料想,与王树楠的认识,为林出以后在新疆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波多野养作从兰州到达肃州后的行进路线为嘉峪关、惠回堡(译者按:即回回墓)、赤金峡、玉门、三道沟、布隆吉尔、小宛、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经马莲井过星星峡进入新疆^①。波多野养作的日记中对肃州至马莲井一带土地、人口状况等记载甚详(同上)。樱井好孝本是科布多派遣员,后来也随林出到达兰州,和波多野养作一起赴新疆。

波多野养作等人来回经过兰州、河西走廊的时间是1905年至1907年。此期间关于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传闻甚嚣尘上,兰州、河西、新疆的士绅间相互把玩敦煌藏经洞流出的文献。波多野、林出等人势必耳有所闻,在回来的路上为何没有去敦煌呢?

笔者分析,这和他们负有特殊使命有关。他们的身份并非考察(调查)和探险,而是负有军部和外务省搜集军事情报使命,故而对敦煌没有兴趣。

另外,当时出嘉峪关到新疆的路线是经安西、柳园过星星峡到达哈密,如果经过敦煌,势必绕道,因此,在来回新疆的路上,波多野、林出以及后面要介绍的日野强等,都没有经过敦煌,但他们的日记等,都记录了一些沿途的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根据《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林出和波多野回程的时间分别为明治四十年(1907)和明治三十九年(1906),回程的路线仍然经过河西。据林出贤次郎的回忆,去时是元月1日到达安西,1月13日到达哈密;回来时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但没有到敦煌是肯定的^[7]。波多野养作到了兰州后还去青海游历,然后顺黄河而下,到内蒙游历后回国。波多野养作后来著《西域地方事情》,曾谈到丝路南道,从安西出敦煌沿大戈壁之南、昆仑山北,出和阗,不过,

数日无水。也提到了瑞典人斯文赫定^②。所记载之人种、宗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通等内容,大多为新疆,很少涉及甘肃方面,也没有提到自己去过敦煌。^③唯有樱井好孝到了新疆后行踪不明,回程路线也无从知晓。

林出贤次郎自新疆考察后,与新疆官员建立了联系,后又到新疆任教习官,伪满建立后,曾任溥仪的随从官。有关他的资料保存得较完整,也有回忆录。关于他的新疆之行,由其口述、波多江种一记录的《关于三十年前伊犁行回顾》一文发表^{[7]171}。

波多野养作则于1935年53岁时突然死去,只留下了考察日记和考察报告《西域地方事情》。

波多野、林出等人的新疆之行,就目的而言,可谓浦敬一等人新疆之行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此次非常明确是由日本外务省出资、由东亚同文书院组织。

日野强的新疆之行

第四批是日本军人日野强的新疆考察。日野强为日军少佐,去新疆的目的是刺探俄国在新疆的举动。1906年7月,出发去新疆,历时一年半,1907年底回国,后著《伊犁纪行》^④。日野强的行进路线是北京、郑州、西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安西、哈密、乌鲁木齐,大约一年半后,经加尔各答乘船回国。在新疆期间,他还与林出贤次郎意外相会,据说将自

①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の研究》第113页3-3图“波多野养作踏查路线、宿泊地以及沿线土地条件分布图”以及111页3-3表“从兰州到迪化的行动路线及观察记录”。

②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の研究》第四章“波多野养作的《西域地方事情》笔记”附录,第169~191页。另外,据该书,波多野养作的著作曾由其亲属皆川初子整理出版,题目为《シルクロード明治一人旅-日露战争末期に外務省の委托により奥地视察した一日本人青年の記録》,新樹会、创造出版,1985年。(见168页注8)但笔者网上检索日本各大图书馆,均无此书。不知何故。

③ [日]波多野养作《西域地方事情》。藤田佳久《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の研究》第四章“波多野养作的《西域地方事情》笔记”附录。

④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其中进入甘肃的记述:第四章,长武到安西(甘肃省)的行程:第一节从长武到兰州,第二节沿途概况,第三节从兰州到肃州,第四节途中有感,第五节从肃州到安西。

己的女儿许配给林出贤次郎。但同样,他虽经过河西,却没有经过敦煌。仅四个月以后,斯坦因即到了敦煌^①。

日野强的新疆之行,其目的和波多野、林出的新疆之行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日野强为军方所指派。

上述诸批日本人的新疆之行,虽然其目的是因为俄国人在新疆的举动,也透露了日益崛起的日本帝国对新疆的觊觎。

除以上外,由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派出的第8期学生“甘肃鄂尔多斯班”以及大正二年(1913年)第11期学生“甘肃四川班”,亦来到过甘肃^②。根据《支那生别全志·甘肃卷》地图所标,“甘肃鄂尔多斯班”从长武进入当时的甘肃省境,经平凉到瓦亭(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大湾乡瓦亭村),分为两路,一路经固原、李旺、戎镇(又名平远,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乡)、灵武、银川到达石嘴山;另一路经隆德、静宁、会宁、安西(今定西)、定远(今定远镇),到达兰州,复经沙泥(今临洮县)、河州(今临夏)、渭源、陇西、武山、礼县、西和、成县、白马关(今康县境内)出甘肃境到达四川^③。

另据渡边哲信《中亚探险谈》记载,他在西安意外地遇见胞弟,由于他未言其弟的名字,以及其

弟到西安的使命,因此无法知道他的弟弟究竟是否到过甘肃^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有边而无防,有关而虚设,打着各种探险、旅游旗号的探险者、间谍,如入无人之境。甘肃作为内陆偏僻的省份,成了列强涉足最多的省份之一。而日本人的进出甘肃,尤其属于此一时期最隐秘的活动而鲜为人知。

参考文献:

- [1] 穆舜英.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M].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 [2] [日] 鯉南瑯. 黑藏. 浦敬一[M]. 淳风书院,1924.
- [3] [日] 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2卷)黑龙会.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M]. 1966 393-394.
- [4] [日] 藤田佳久.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の研究[M]. 大明堂,2000 46.
- [5] [日] 渡边哲信. 中亚探险谈[A]. // [日] 长泽和俊. 西域探险纪行全集 9·大谷探险队丝绸之路探险 第9卷[M]. 株式会社白水社,1966 52-53.
- [6] [日] 大学史编纂委员会.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M]. 沪友会,昭和五十七 373-374.
- [7] [日] 林出贤次郎谈·波多江种一记. 回顾三十年前的伊犁行[J]. 支那第29卷第6号,昭和十三:175.

① [日] 金子民雄《进入中亚的日本人》,中央公论社,1992年。

② [日] 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甘肃省(附新疆省)》“凡例”,大正七年(1918)。

③ [日] 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支那省别全志·甘肃省(附新疆志)》。

④ [日] 长泽和俊编《西域探险纪行全集 9 大谷探险队丝绸之路探险》第54页。